

中国知识精英的

ZHONGGUO ZHISHI
JINGYING DE
WENHUA KULV

张宝明 著

文化苦旅

中国知识精英的

ZHONGGUO ZHISHI
JINGYING DE
WENHUA KULV

张宝明 著

文化苦旅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苦旅/张宝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01-009503-5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名人-人物研究-中国-近代②文化-名人-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9176 号

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苦旅

ZHONGGUO ZHISHI JINGYING DE WENHUA KULÜ

张宝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75

字数:246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01-009503-5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言

在苦旅中憧憬未来

20 世纪是一个充满着坎坷和沧桑、荆棘与迷雾，同时又满载着鲜花和掌声、光荣和梦想的世纪。上世纪的那些思想先驱，是动荡、战乱、忧患中的一代又一代，他们对“诗意的栖居”的境界一直心驰神往，但却无缘置身其中。他们的命运和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同胞维系着，对他们而言，展望和憧憬构成了对未来的一种奢望。一幅幅世纪蓝图，若隐若现地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有鉴于此，笔者一直承诺要对贡献 20 世纪的文化和思想先驱做一次深情回眸，每当我联想起那一颗颗世纪苦魂，我就按捺不住心潮的澎湃。万千思绪的奔涌构成了我和世纪先驱共度孤独和寂寞的时光。是忧患，更是风流，百年的忧患和一个世纪的风流演绎出了抑郁、低沉但却充满预言和前瞻的心灵摇滚。

在世纪先驱的花名册里，风流倜傥、潇洒性情、学贯中西的思想巨子不在少数，问题接踵而来，20 世纪知识分子的文化苦旅如何落笔？

首先是本书的体例问题。如果按照编年史的人物排列方法，百年来思想文化人物的精神谱系一目了然，这不失为一种叙述方式，但是，我同时又不能不感到如此写法的单薄与轻飘——一个非常凝重的话题这样完成未免有些糟蹋的味道。经过反复思考，我决意采用“板块”式的思想凝铸方法来梳理世纪才俊的文化路径。于是，“改造国民性潮流”、“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新儒家”这五大思想模块就有了一个基本的雏形。其中各个板块分布的人物也有了一个大致的脉络。当然，这几个思

想板块并不能囊括 20 世纪各尽风流的文化人物及其所流布的思潮，在很多情况下只能选择那些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历史星辰了。即使是已经选定的思潮板块，其中的思想文化人物也还只能是“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其次要说的是本书的内容涵盖。就我们选定的几个思想板块来看，每一思想板块都有其独到的风景线，而且其中的人物璀璨如星，割舍哪一颗都是要忍痛的。我在每一思想方阵里选择三位知识精英作为立论的核心，并以此展开对该思潮的剖析，这既是内容的需要也是形式的必需。“改造国民性”思潮里有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也有严复、傅斯年等没有入围或进入它围的人物；“自由主义”一节，三代人严复、胡适、殷海光只是笔者的一个历史自觉，高一涵、周作人、徐志摩等人都非常遗憾地排在了圈外；“激进主义”的阵营本来是分为上下两个营垒的，即是：以刘师培、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一个“板块”，以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陈独秀也可列在其中）为一个“板块”。但由于主客观的双重原因，笔者刚开了头又很快收住，最后只以现在诸位见到的谭嗣同、章太炎、李大钊为实。“保守主义”方阵的辜鸿铭、杜亚泉、王国维之间的松散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个松散也是有意安排的。因为在他们之外的吴宓、林纾、陈寅恪、梁漱溟等人物未能囊括。在“新儒家”一族里，我遴选的梁漱溟、钱穆、牟宗三三位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儒家性情，他们在年龄上有差异，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内涵上各有其景。如此一来，冯友兰、贺麟、熊十力、方东美、徐复观、张君勱，包括新崛起的海外学人杜维明就都成了割舍之爱。

显然，我这里的内容涵盖既有思想文化人物的“挂一漏万”问题，也有思想模块的难以定型问题。事实上，在很多 20 世纪文化人物的思想世界里，他们的精神交叉一直是后来者比较困惑的研究眼障。比如梁漱溟，他是学术界公认的“最后的儒家”，也是第一位新儒家。如果将其放在保守（守成）主义的营垒里予以考察也不失为一种恰当的安排。好在这样的模块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应地，这里的模块框定标准也是“自以为是”的——我认为点名道姓地守护儒家的人文精神者更接近“新儒家”的原旨。同样，对陈独秀来说，“改造国民性”固然是他思想园地里十分丰

硕的收成，可是将他移位于激进主义的大纛下“表演”同样精彩纷呈。以此类推，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但他的“改造国民性”的努力也是以心恸情愫的，而且是与自由思想密不可分的；胡适、殷海光的自由世界里，激进的情绪与态度也是不可勾销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精神类型的划分也是相对的：它只是论述过程中的形式需要。中国有句俗话说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很有意思。或许，在我的下一本书中，这样的一种思想体例之模块组合就会以新的面目出现。

基于以上两点的说明，诸位或许已经感悟到，这是借助思潮模块形式对世纪思想文化人物进行辨析。固然，借助思潮论述人物与借助人物论述思潮是相辅相成的，无论立足点在哪里都不可“孤立无助”。但是，本书的立意不是对思潮本身之幽微曲折的阐发，而只是对思潮意义下风云人物之精神奉献的解读。

最后要交代的是本书的思想路径与叙述方法。在学术研究意义上，本书无疑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就思想史本身的学科归属来讲，它既有历史性，又有思辨性。因此本书在注重历史感的同时，重点关注的是人物文化内核中最为敏锐、活跃或说到现在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火花。在历时性中体现共时性，在回眸过去中体现当代性，在价值的摄取里体现批判性，在司空见惯的思想资源里渗透着强烈的生命体验与感悟。可能，对笔者来说，这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奢望。尽管如此，我还是以热烈的情怀投入地拥抱世纪先驱们。在具体的章节叙论中，分论与合论相结合，先分后合是各个章节的共性。分论，一般是从介绍人物的生平和思想经历开始，然后对其思想内核中最关键和最富“意义”的资源做必要的涵盖与分析，力求对人物思想的来龙去脉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合论，则将该思想模块人物间的趋同与个性特点作为推销的“卖点”。必须说明的是，或许是由于自己定位在先的缘故，有些地方历史原典的大段引用有可能淡化思想的辨证，个别激情飞跃的语言又可能将历史感淡化。

不过，我还是坚信这样的轻松阅读并不失为一种应该提倡的研究与写作方式。毕竟，我们已经受够了那种故作深沉、晦涩难懂的思想史书写。文如其人，矜持不是我的性格，城府不是我的专长，装腔作势与拿腔拿调都是我最腻歪的东西。如果说本书有什么可取之处，也就都在这里了。

陪伴先驱思想，重温心灵苦旅，卸载文化包袱，展望未来蓝图。这就是思想史言说的意义所在。在我们品茗聊天、漫步赏景的闲暇时刻，与先贤对话不失为一种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最佳方式。在这里，起码我们能找到尊重自我的意义和尊严。当下，我们缺少的不正是这个吗？

目 录

前言 在苦旅中憧憬未来	1
第一章 “改造国民性”：世纪初的主潮	1
第一节 “新民说”：世纪启蒙的发轫	1
一、梁启超：“两头不到岸”的思想之舟	2
二、“国民性”：“公德”与“私德”的交战	3
三、“自由”与“权利”的歧义	9
第二节 《新青年》：世纪的风流	12
一、陈独秀：由民主而自由的历程	12
二、“新青年”：被唤醒的雄狮	15
三、“个人”与“社会”的砝码	21
第三节 鲁迅：永远的“国民性”	27
一、“精神界之战士”	27
二、阿Q：“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30
三、“思想自由”与“民众合力”的吊诡	35
第四节 现实关怀·社会关怀·人生关怀	39
一、着眼点：同立于思想晕轮的圆心	40
二、兴奋点：“同唱一首歌”	43
三、归宿点：来自不同终端的关怀	45
第二章 自由主义三代人	52
第一节 “自由”：“群己权界论”	52
一、严复：激活于英伦	52
二、自由：“群”与“己”的摇摆	56
三、两种自由的涵盖	63

第二节 “自由”：“健全的个人主义”	67
一、沐浴在“美雨”中	67
二、胡适：内倾的自由观	72
三、永恒的价值资源	79
第三节 “自由”：“高度的自由”	85
一、“五四的儿子”	85
二、殷海光：“自由与民主”的辨析	90
三、“高度自由”的精神	95
第四节 自由：并不一致的代价	101
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101
二、自由的基线	103
三、“自由”的歧路	110
四、“自由”的结语	116
第三章 激进意义下的精神类型	118
第一节 “恨铁不成钢”	118
一、“世家子弟之桀骜者”	118
二、谭嗣同：诗意浪漫的“激进”	121
三、两难：殉道者的悲患与乐观	128
第二节 学问家与革命家	132
一、双重角色的扮演者	132
二、章炳麟：“用国粹激动种姓”	135
三、“依自不依他”	140
第三节 深情的历史选择	145
一、书生革命家的情怀	146
二、李大钊：“调和”的价值意义	149
三、“一力之独行”	153
第四节 拒绝平庸：对激进主义检讨的再检讨	161
一、“自我”膨胀：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胜利法”	161
二、“个性”消泯：以“心”入世的乌托邦	166
三、“心不从心”：另一种逃避	170

第四章 保守主义：另一种文化资源	174
第一节 拯救与逍遥：文化功夫释义	174
一、“文化怪杰”	175
二、辜鸿铭：“富于想象的理性”	177
三、“守”出真性情	181
第二节 “整合”：面对“迷乱之现代人心”	184
一、“东方之子”	184
二、杜亚泉：无法化约的“保守”	186
三、“统整”：来自世纪末的初步评价	190
第三节 吊诡：在“可爱”与“可信”之间	194
一、孤独的哲人	194
二、王国维：“科学”与“人文”紧张的典型案例	195
三、“死”的意义拷问	202
第四节 守成：中心与边缘的涂改	206
一、“尴尬”的启示	206
二、差异：在和谐的同唱里	207
三、相对于“激进”的评价	211
第五章 “新儒学”：世纪末的复出	214
第一节 定位：在文化三路向之间	214
一、“新儒家”第一人	214
二、梁漱溟：“文化三路向”之说	216
三、“中国文化要义”	220
第二节 “文化更新”：“以人文精神为中心”	225
一、海外新儒家第一人	225
二、钱穆：“人生三路向”	227
三、“历史”视野下的“特殊精神”	231
第三节 “三统” 并建之路向	235
一、孤傲的后来者	235
二、牟宗三：“离教”与“圆教”	237
三、“三统”：道德理想的深层言说	241

第四节 “新儒家”：化解紧张之后的紧张	244
一、“返本”：一个基本信念的确立	244
二、“开新”：体系内部的紧张	246
三、文化及其承诺	247
结语 在憧憬中感念苦旅	250

第一章

“改造国民性”：世纪初的主潮

近代中国历史的屈辱给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特定的活动舞台。19 世纪的那场变革留下了时代先驱在寻求真理过程中鲜明的足迹。但这一从“器物”到“整体”的突变使那些思想先驱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历史只能在遗憾中叹息，虽然非理性时代更多的是喧嚣与骚动，鲜有成熟思想，但是随着对国情和救亡道路认识的日渐深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倡导的维新运动则为 20 世纪先进文化做了铺垫。尤其是梁启超“新民说”的问世，可谓开启了世纪思想启蒙的先河。接踵而来的陈独秀、鲁迅以及由他们的同人共同酿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推波助澜，将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化启蒙标举到了时代的浪尖上。

第一节 “新民说”：世纪启蒙的发轫

选择梁启超作为我们的论著中的第一位风流人物，实在是因为他“两头不到岸”的时代过渡特征太具有代表性了。进入 20 世纪，他心灵深处来得更不平静。从传统到现代的冲突使近代知识精英承受着历代知识分子所不曾有的灵魂拷打。改良流血而无动于世的凄凉现实触及了先驱那根敏感的神经，于是“改造国民性”的思绪渐渐积淀成了为救亡而设的国格观念。从他的生平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新民说”激活的不易与沉痛。

一、梁启超：“两头不到岸”的思想之舟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在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当中，他的举人身份显得有些特殊。这种“特殊”具体表现在他一个人仿佛有两个头脑，一个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是西方舶来的。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经历以及1895年随师“公車上书”的举措催化着他渐渐离开“此岸”走向“彼岸”。但是，由于“知”与“行”的两难时刻困扰着他那颗不安定的灵魂，因此“两头不到岸”的“夫子自道”就成了极为准确的梁氏自画像。严格的家庭教育令其自幼便养成了志高气大的性情。12岁的他登上家乡的凌云塔曾情不自禁地吟出了这样的诗句：“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如此的胸怀为他日后无论是政治改良还是思想启蒙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戊戌变法前，他以《时务报》起家，一直吟唱着君主立宪的“民权”小夜曲。他那《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章的发表正应验了他自己当年“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的率真性情，一时间成为“言论界的骄子”。政治改良的举措在他心中像一匹不羁的骏马，万变不离其宗：“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并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流血的阵痛铸造了20世纪最初几年这一时段的思想巨子。自1903年开始，“新民”的思绪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1905年，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在改良与革命的问题上同他的对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实际上是整个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道路途中两条路径冲突的起点。论战的要点无非是国民素质的高低层次到底适合什么体制的命题。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斗得不可开交。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期望清政府走向君主立宪的道路。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后，他一度表现出对革命派的同情。1913年，自海外归来的梁启超陡转风向，出任共和党领袖不说，而且又组织了什么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袁世凯称帝的阴谋暴露后，他从拥护袁世凯很快发展到策动蔡锷护国军反袁。时至五四，他成了一位积极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专制的新文化同路人。在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的论战中，他还曾是支持张东荪和马克思主义者论

战的主要人物。

“易质流变”构成了梁启超“自我交战”的性格特征。或许这一代先驱的风流就风流在特殊时代的“过渡”上，“情”与“理”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体”与“用”的摇摆……倡导过“开民权”，标榜过“保皇”，鼓吹过“开明专制”，提倡过“西方文明”，还曾是“科学破产”论者。梁启超晚年对自己“太无主见”的性情也有过深刻的解剖。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坦率地说：“保守性与进步性常交战于胸中”，“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二、“国民性”：“公德”与“私德”的交战

我们看到，就是在梁启超作为思想家的层面来说，他最具闪光点的“新民说”也是充满了“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两难。一位政治改良家眼中的启蒙难免出现吊诡的情形：“国民性”中的“私德”与“公德”哪一个更重要？

在论述“新民说”之前，我们有必要预知这位启蒙者的一个著名论断。那就是他在《过渡时代论》中重点突出的“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时势英雄，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耶？吾辈虽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求英雄。英雄之种类不一，而惟以适于时代之用为贵。故吾不欲论旧世界之英雄，亦未感语新世界之英雄，而唯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限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危亡情结隐隐作痛，于是呼唤“英雄”就成了先驱者呐喊的最强音。那么，梁启超心目中的“英雄”究竟是怎样的角色呢？同样是出于救亡心切的缘故，思想启蒙大师的文化选择也显示出了“武化”的特征：“其一冒险性，是过渡时代之初期所不可缺者也。”其二、其三则是“忍耐性”与“别择性”。所谓“别择性”，用梁氏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军人之魂，佐以政治家之魂。”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英雄的振臂一呼能“立竿见影”吗？中国自古就有“人人皆可为尧舜”的传统，于是我们的先哲如此“过渡”道：“一群中人，各备一德，组成团体，互相补助，抑其次也。嗟呼！英雄造时势耶？时势时势，宁非今耶？抑又闻之，凡一国之进步，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

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的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故吾所思所梦所祈祀者，不在轰轰独系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不难发现，梁启超让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了“别择性”，而他本人却是别无选择。“过渡时代”的特定情形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新民说”在“作始也简，将毕也巨”。^① 1902年2月8日起，梁启超正式开始了奠定他思想基础的“新民”生涯。到1904年，他的一系列“新民”文章已经占据了20世纪初年思想舆论界。毋庸讳言，在戊戌前后他就有了这种“说法”，但是应该看到，流亡后的他才有了更深刻的体认，特别是东瀛明治维新的影响与启迪，使得梁思考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新型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关于这一思想脉络的原始冲动，梁启超在“叙论”中表述得非常明白：“然今之亚美利加，犹古阿美利加，而央格撒逊民族何以享其荣？古之罗马，犹今之罗马，而拉丁民族何以坠其誉？或曰：是在英雄。然非无亚力山大，而何以马基顿今已成灰尘？非无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几不保残喘？呜呼噫嘻，吾知其由。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② 这就是他“新民说”的全部。在梁启超那里，由“立人”而“立国”的思路了了分明。如同盖楼建房需要砖瓦一样，目前“新民为中国第一急要”。

立于民族兴亡的关头，既然“新民”迫在眉睫，那么路又在何方呢？梁启超已经有了自己的“金刚钻”：“故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今论者于政治、学术、技艺，皆莫不取人长以补吾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不取于此而取于彼，弃其本而摹其末，是何异见他树之蓊郁，而移其枝以接我槁干；见他井之汨涌，而欲汲其流以实我智源也。故采补所本无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长

①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思。”^① 不难发现，梁启超的“新民之道”中充满了浪漫与天真，惟其天真与浪漫，才有了一份饱蘸血泪的真诚。

在梁启超的“新民”处方里，其中最为关键的三味主干要素是：民德、民智与民力。而在这一体三维的思想构架中，又以“民德”为首选。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民德最合乎启蒙者的心愿呢？我们看到，梁氏的“新民说”万变不离其宗，一言以蔽之：“群”。“不群”是他极力攻击的对象，“善群”与“合群”则是他立意推崇的价值趋向。“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的这句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成了他的理论依据。他说：“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② 及此，我们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公德”。梁启超的逻辑设计出现了两个砝码。这两个砝码悬挂在“群”的两极，形成了一块巨大的精神跷跷板。

上面我们已经论及了精神跷跷板中的一块，那么另一块又是什么呢？——“私德”。而且，饶有趣味的是，梁氏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③ 即是说，中国国民缺少“国家”意识。就此而言，梁氏的“新民说”中夹杂着浓厚的近代国家观念。这种国家观建立在民族危机的土壤上，因此显得非常自然。在《论公德》中，梁启超对中国的旧伦理与西方的新伦理观做了这样的比较：“旧伦理所分类，曰君臣，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④ 固然，这里我们不能说梁启超的判断错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完全是站在民族、国家之救亡的立场去谈这些话的。事实上，中西伦理的差异还有更本质的不同。进一步说，“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就绝对不是西方伦理的全部。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十分讲求“公德”的国家，“群”的伦理灌输在历代统治者那里都是极为当紧的，而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却是不容乐观的：中国人的私人情结极其严重，以

①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

②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

③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

④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致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与此同时，在中国这个私德横流的国度里，个人主义又是极为匮乏的价值取向。于是，在梁启超一味强调“公德”的同时，他的心里也不能不打鼓。“私德与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①既然两者并行不悖，何以要将公德的大纛举在上面？原来，梁启超的集体主义道德观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他的思想导向。所以，即使在他谈私德的重要性时，也离不开为公德“付出”的必要性。

梁氏的新人格之理想洋溢着民族“和合”的凝聚力情感。他将中国传统的协作精神赋予一种近代国家观。他不愿自私自利的原始修身结果再在当今出现。恰恰在这里，我们发现在梁氏“国家思想”与“权利思想”两种思想形式有机结合的同时，内部又发生着激烈的冲突。或许，他个人当时并没有认识到，但是现在看来，问题远非如此简单。

梁氏的“国家思想”意在批判只有家而无国的家族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的来源就在于几千年的小农宗法社会的“治绩”。在他看来，良好的“国家思想”就是“利群”。为了“利群”，就要有“进取精神”、“尚武精神”。在这种种“精神”背后，它们都是以付出自己的利益与权利作为代价的。在“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的大纛指导下，你“自我利益”的理由即使有千万条也没有一条可爱的：

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人生与忧患俱来；苟畏难斯落险矣；吾见夫今日天下万国中，其退步之速，与险象之剧者，莫中国若也，吾为此惧。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道天下所不敢道，为天下所不敢为，其精神有江河学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气魄有破釜沉舟，一瞑不视之概。其徇其主义也，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观。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其成也，洒脑精以买历史之光荣；其败也，迸鲜血以赎国民之沉孽。呜呼！曷克有此，曰惟进取故，曰惟冒险故！^②

为了集体、民族、国家的利益，梁启超力陈牺牲自我之“冒险精神”

①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② 《饮冰室文集》，台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页。